

遇见胡适

——2019年“胡适奖学金”获奖感言

尊敬的黄进兴副院长、巫仁恕副所长、潘光哲主任、李馆员、各位先进，大家上午好！

感谢“中央研究院”近代史研究所胡适纪念馆和华中师范大学，授予我2019年“胡适奖学金”！感谢两岸评委会老师对我的鼓励！感谢导师何卓恩教授的精心指导！感谢之余，也颇感惭愧。毕竟，拙作并非直接以胡适先生为选题，而且甚至以先生的论敌们为研究对象。正像潘主任在武汉时所介绍，“胡适奖学金”颁给批评胡适的论文，体现了胡适纪念馆的广阔胸怀。

以下感言如果有一个题目的话，就叫“遇见胡适”吧。

七十年代初，我出生在华北农村，不可能知道胡适先生。小学课本中的“宝岛台湾”，对我来说也只是一个未曾企及的遥远的梦。八十年代中期我读初中，一曲清新脱俗的《兰花草》飘满校园，也香满校园。可我并不知道它的词作者是胡适先生。2014年，学位论文选题的时候，“胡适奖学金”尚未设立。2015年，海峡两岸两个重要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机构合力搭建了这个平台，这对推动胡适研究和两岸学术交流意义重大。今天，在胡适先生128周年诞辰的日子，我有幸在先生最后工作和生活的地方，接受以先生名字命名的奖学金。此刻，我不禁想到当年很流行的那句话“我的朋友胡适之”。蓦然回首，往事历历，感慨系之。“遇见胡适”好像恰恰诠释了历史发展的极大偶然性。

然而，仔细一想又不尽然。毕竟有一种力量让我的生命一步步走近胡适先生。在博士论文中通过流亡港台传统派知识分子而“遇见胡适”，也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。请容我简要介绍一个农村小孩儿的“阅读史”。我小时候，华北农村较容易得到的书就是一些古典文学、历史演义。四年级时我从县城买到一本《绣像三国演义》，这本书对我影响很大，我隐约觉得这是一部写英雄的书，其中我最佩服的是关羽。中学时期，大量租阅武侠小说。至此，我的脑海染上了“忠孝仁义”传统文化的底色。

八十年代的最后三年我读高中。适逢两岸关系的改善。中国近代史课本中开始对国民党抗战给予积极评价，特别是“新文化运动”一节内容中赫然出现了“胡适”和“文学改良刍议”的信息，我第一次认真地记住了胡适先生的名字。还有，当时流行《丑陋的中国人》，“酱缸文化”令我感到既新奇又震惊。我的大学遭遇“文化热”的余波，时在图书馆借到一本《传统意识的现代命运》，它的“问题意识”成为我的“心结”。参加工作后读了李泽厚先生的《中国现代思想史论》：“‘五四’是一个群星明灿的时期，许多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，

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以后还有持久影响的也不少。其中，胡适、陈独秀、鲁迅，无疑是屈指先数的前三名。”文章赫然把胡适先生排在“群星之首”。我向胡适先生又走近了一步。

博士论文选题时，基于“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”这一问题意识，在何老师的指引下我选择了《民主评论》作为研究课题。现在看来，这实际上注定了我和胡适先生的相遇。因为，在近代中西文化相遇的壮阔图景中，五四以来启蒙与传统的论争已成为思想史上的一条“存在巨链”，而胡适又恰是启蒙一端的灵魂人物，研究“传统文化的现代命运”必将遇到胡适，正如中西文化之必然相遇。1949年的“大变局”并未割断此一“存在巨链”。“天翻地覆”中，少数知识分子漂泊香江浪迹台岛。相聚在狭窄的空间里，传统派和自由派既“命运与共”又“冤家路窄”。在时空转换的背景下，在道学政的纠葛中，一方寻求儒家传统的“灵根再植”，另一方则秉承五四启蒙精神继续反传统。“非常时代”之思潮撞击掀起洪涛巨浪，激荡出传统派之“文化中国意识”。在研究的起点，我对传统满怀“温情”与“敬意”，至论文的终点，我对启蒙满怀着理解和崇仰，我对“从来没有变过节”的自由斗士胡适先生满怀钦慕。呜呼！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。剧变之际，“徐复观们”和“胡适们”对国家命运的省思感召着我，他们的艰苦求索、使命担当诫我以“任重道远”，他们的生命经验、人格风范已融入我之血脉，建构了我之生命，导我以“为己之学”。

感谢我的生命遇见胡适先生！

中研院讲坛崇伟，志勇学识浅陋，能不诚惶诚恐！此引胡适先生《中国科学社社歌》词句以结束演讲：“不怕他真理无穷，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。”不敢言共勉，谨以自勉。

谢谢！

王志勇

台北 胡适纪念馆

2019年12月17日